

ZHONGGUO NUZI
JAOYUSHI

中国女子教育史

雷良波 陈阳凤 熊贤军 著

武汉出版社

ZHONGGUO NUZI JIAOYUSHI

中国女子教育史

雷良波 陈阳凤 熊贤军 著

(鄂)新登字08号

中国女子教育史

雷良波 陈阳凤 熊贤君 著

•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20号 邮政编码430014)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13.5印张 字数 300千字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定价: 15.00元

•

ISBN 7-5430-0906-4/K·120

导 言

“人是什么？”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长期以来成了哲人们追寻的谜。为此，居然有众多的不朽著作问世。

“女人是什么？”自然而然，也就成了人是什么问题的另一半。

《创世纪》有这样一个神话，“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它与肉合起来。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取下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神话不可信，但神话反映了一定的道理。

问题是，照此论理，世界上是先有了男人然后才有了女人？这一结论，同哲学上“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一样，不也就使人迷惑难解吗？！

不过，神话终归是神话。透过它，却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些真谛，那就是，世界上有了人之后，女人是依附男人而生存，女人是为着男人的需要才有其女人的地位的。当然，这一所谓真谛反映的是过去人类的历史。

迷惑之余让人们清醒，继而我们重归于失望。我们失望于那在人类历史上曾闪耀过光芒的母系社会，失望于担负同男人一样生产和蕃衍人类的母体，失望于最早担负向一代又一代后人传授生活知识（在没有书本知识以前的漫长社会里）的人类最早教师。总之，我们为孕育人类的母体而苦恼，而不平。

自有人类以来，人类社会是对称而同时存在的。从整体上讲，男女性的相对性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基本平衡的。从人类社会的

发展史看,母体社会(严格地讲应是母系或母权社会)应该更漫长于男权社会,可惜的是,史前的资料太有限,我们很难亲见母权时代的细部,探测不到蕃衍人类之女神们的奥秘。但从社会发展史,具体地说,从母权制后期或末期所遗留下来的极少数、并且极零碎的一点神话和洞窟壁画中,我们知道:“人类两性那种美丽的对称性并不是男性手中的权杖打破的,它早就被打破了。自从男性骄傲地赢得了那场激进的革命,与昔日的女神互移位置之后,他们是毫不犹豫地,加倍强化了这种非对称性,从而使女性落进了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深渊之中”。^①

从此,取代母权社会的是父权制的到来,而且这种制度的一旦产生,就延绵了数千年,特别在我们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度里,至今仍有难以消弭的影响。

这种父权制的诞生,便自然而然地拼命创造出男性世界的神话、宗教、法律、伦理、道德……

这种父权制文化结构,便自然而然地拼命反映男性的兴趣、男性的经验、男性的美德……

这种父权制文化的延伸,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以男性为本位的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说。

从此,男权社会(至少在中国历史上的男权主义)的文明,回答了“女人是什么”的问题——“女人,从人也”^②。从何人,当然从的是男人——“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夫人,扶人也”^③,服侍何人,当然服侍的是“官人”(丈夫)、“小官人”(儿子)……。

于是,维护男子世界,维持以男性为社会主体的男权学说,便有了父(夫)权制、封建制下的女子教育学。

平心而论,中国历史上,具体地说,中国封建社会里,其女子教

① 筱敏《女性的天堂》。

② 《女四书》。

③ 《教女遗规》。

育,是最严格、最系统,且备受社会重视的一种教育。其教育形式和内容,不但延续了数千年,而且其内涵和实质对近代中国乃至当今社会,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首先追溯到上古社会。众所周知,在人类教育发展史上,教育在家庭出现之前,早已在人类的生产劳动中产生了。在群婚制阶段,在人类“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时代,在妇女主政的时期,初为人师之母,实际上最早担负了教育自己和教育下一代的职责。当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即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产生之后,家庭亦开始行使子女教育的重要职能。毫无疑问,女子进行和接受家庭教育(自然生活和生产技能教育)的最初权力,不异于男子。

然而,男女进行教育和接受教育的权利终于有了区别。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愈来愈分明且愈来愈细,也由于男女性别体质的差异,特别是随着父权制的确立,随着一切文明都为男子所垄断,一切道德均为男子创造;一切政治,均为男子所盘踞;一切经济,都为男子所操纵,乃至宗教、法律、文学都成为男子的逐鹿场之后,女子亦逐渐失去了投身的地方。渐渐地,女子生活和活动的圈子便完全固守于家庭,其接受教育、权力亦便完全局限于家庭。

“教育之本,源在家庭。”教育来自家庭的来自父母的教育,这在学校产生之前,亦为正常的人生教育的必经阶段。过去如此,现在亦如此。问题在于,“党有庠,乡有序”,即中国最早的学校产生之后,随着私学的逐渐普遍,女子却不能同男子一样进入学校学习,特别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孔子语)语出之后,即在逐渐封建化的社会里,男女教育更有了绝然的区别。《内训·序》:“古者教必有方,男子八岁而小学,女子十年而听姆教”,从此,男女在接受了特定的自然生活教育之后,一俟到了上学的年龄,便有了区别,女子的教育,只能在闺庭绣阁。

男女教育的最大差别不仅仅只是表现在形式上,就其教育内

容而论,亦有绝然的区别。就男子方面,读书习礼,寻求的是做官(求仕)的道路;而女子,则重于伦理说教,接受的是如何做人处世(做人妇)的训练。为此,无论是文王时代,王季妃太任的“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的孕妇规范,还是整个封建时代完全规范化后的“三从四德”,前者,虽然有最早“胎教”的真涵;后者,也严格了家庭主从秩序,然而,都是严格女子,放任男子,实际上强调的是女子的修身之言。而对于女子的种种说教,无须藉学校,只要由父母特别是由母性代代相传就可以了。这一套在后人所撰女子教本——《女论语》中说得极为明白:“有女在室,莫出闺庭;有客在户,莫露声音”(第十二章),还有的女子教本说“女子者,顺男子之教而长其理者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所以为教,不出闺门。”这一套,也就在事实上严格了女子从小便只能在家庭里接受来自父母的教育。通俗地说,即所谓“闺门之教”。对此,少年女子如此,青年女子亦如此,出嫁后之女子仍然如此。这些,且不说《女四书》——封建社会女子读(教)本中,《女诫》有教成年妇女的“妇行”篇;《内训》有已婚妇女的“修身”篇、“景贤范”篇、“母仪”篇;《女论语》有在嫁女子的“事夫”篇、“营家”篇、“和柔”篇;《女范捷录》有作人母后的“母仪”篇等教成年妇女为人处世、做人行事的内容,而且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还专有教刚刚作人妇的,即如何做媳妇的《新妇谱》、《新妇谱补》等,历史发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乃至国民政府之后,在袁世凯复古主义教育思潮中,又有专教如何作人母的《母道》出版。传授这些读(教)本,下至黎民百姓,上至帝王之家,其女子不论少者、年青者乃至年老者,无须进学堂就读,无须求师教,完全在家庭里通过父母尤其是通过母亲来传授,或者通过民间流传的形式进行教育。因而,在中国女子教育中,又逐渐有了《女儿三字经》,而且盛久不衰。以上所列举各种女子读本,在古中国的学塾里乃至在近代学堂里,是见不到的。当西学东渐,西式教育被中国接受后,虽然有教育女子之家事科,然而未见将这些古本搬到课堂的。唯一的也

是本质的区别是,从此,中国的女子虽然也在习惯上接受旧式家庭伦理教育,但他们却从此走向社会,进入学堂,接受科学教育了。

在古代中国,女子的教育是极受封建统治者和旧官府重视的。明代仁孝文皇后撰《内训》,在其死后,明成祖特地为该书作序,并将此书“颁赐臣民”。到了清朝初年,当王相将此书和历史上班昭的《女诫》,宋若华、宋若昭的《女论语》以及其母的《女范》(亦称《女范捷录》)合编成《女四书》时,便很快传遍了粉楼绣阁。此前,明神宗还专门为《女诫》作序,序中提及《内训》,“俾诸保姆朝夕进讲于官”,指定为皇室后宫的必学教本,并将该书“颁示中外”,使“民庶之家保以训诲女子”。

为什么封建统治者如此重视“闺门之教”?这是由封建社会女子教育的内容和本质所决定的。

首先,重“闺门之教”,在于稳固男权。众所周知,支配中国社会灵魂的是儒家思想。而儒家之女性观,一是完全恪守“男尊女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甚古《易经》,成为了儒家思想的社会和家庭男女观的理论依据,并以此明示“男尊女卑”而不可变;二是信奉“男外女内”为天经地义。认为女性对于男性,只能恭顺而屈从,女人的价值只在于“服侍男人”,在于“生儿育女”;三是强调女子生活规则的所谓“清贞”、“贤淑”和“恭顺”,以此凸现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维护封建主义的男权。后产生于封建社会的一些女子教(读)本,也无不充斥着儒家这些思想和道德旨意:

——《内训》序说:“夫人之所以克圣者,莫严於养其德性,以修其身,故首之以‘德性’,次之以‘修身’。修身莫切于谨言行,故次之以‘谨言’、‘慎行’。推而至于‘勤励’、‘节俭’,而又次之以‘警戒’。人之所以获久长之庆者,莫加如于‘积善’,所以无过者,莫加于‘迁善’。数者皆身之要,而所以取法者,则必守我高皇后之教也,故继之以‘崇圣训’。远而取法于古,故次之以‘景贤范’。上而至于‘事

父母’，‘事君’、‘事舅姑’，又推而至于‘母仪’、‘睦亲’、‘慈幼’、‘待下’，而终之以‘待外戚’。顾以言辞浅陋，不足以发扬深旨，而其条目亦粗备矣。”以此“资于内治”。

——《女范》统论篇说：“乾象乎阳，坤象乎阴。日月普两仪之照，男正乎外，女正乎内，夫妇造万化之端，五常之德著，而大本以敦，三纲之义明，而人伦以正，故修身者，齐家之要也。而立教者，明伦之本也……是以教女之道，犹甚于男，而正内之仪，宜先乎外也。”

——《女论语》序传说：“因辍女工，闲观文字，九烈可嘉，三贞可慕，深惜后人不能追步。乃撰一书，名为《论语》，敬戒相承，教训女子。”

——《女诫》原序说：“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加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因作《女诫》七篇，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俾助汝身。”

女性作书，也习以为常地为男性社会说话，完全将自身置于家庭、家族成员之下。可见，在封建社会里，广大女性不但在心理精神上，而且在行为上完全成为了男权的俘虏，从而在家庭伦理方面严重地自我束缚起来。因而，封建社会的女性，无不为了所谓“清贞”而诚服于男性，冯飞《女性论》说，女子“不但仍仰男子以为生存，并增加其依赖与奉伺之性”而倾身于男权。正如陈东原先生所言，在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里，女子无人格，只能依男子而成人格。

其次，重“闺门之教”有利于皇权的巩固。皇帝是封建社会中最大的地主，皇室则是最大的家庭。帝王如何在管治整个“王土”的同时，使“后院”安宁，以在管理好皇室家族的基础上，更好地统领天下。历来，封建帝王是很重视皇室的家庭教育，尤其是皇室中的女子教育的。如果说，皇帝是全国一家之长的话，而皇室内务，则完全由“皇后”（东宫娘娘，正室）掌管。如《女诫》的作者班昭，作其书之目的，就在于裁定女子生活之标准，以在朝廷提倡礼法。因此，她即

应汉和帝之召入宫，作皇妃贵人之师傅（实为皇家的女子家庭教师）。而著《女诫》之始末由来，完全是因为“圣恩横加”，才“系统的把压抑妇女的思想编纂起来，使他成为铁锁一般的牢固，套上了妇女们的颈子”^①。再如《内训》的作者就是皇家后宫总管（仁孝文皇后，明成祖妻）。据她自序所言，其作书之原委，一是受到先朝皇太后（朱元璋妻）的教诲影响，效法其辅助成就朱元璋之事业；二是为了颂扬“皇上内治之美”，为了“以崇圣训”。就此，明神宗皇帝在御制《女诫序》中说得更明白，“礼称天子理阳道，以听天下之外治；后理阴德，以听天下之内治。男女正位，化成俗美，故能不降阶序而天下咸理”，其最终目的，便于帝王“统膺鸿绪”。

管束妇女的绳索，居然也套在了帝王之家中上至皇后、下至宫女身上，后者在情理之中，前者似为费解。其实不然。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史，成就帝王之业的皇家女子有之，如唐太宗之长孙皇后，明太祖之马皇后；断送帝王之家的也有之。虽然在今天看来，断送天下其责任全然不在她们身上，然而这在封建帝王看来，这不得不引起他们的重视。因此，朱元璋在夺取天下，建立明王朝之初，便在后宫立三尺铁碑，在上书“宦官不得干政”的同时，明示了“后宫不得干政”的“祖训”。实际上，这既是对皇家女性的警告，也是对她们的教育。再说，历代王朝设女官，教育皇室女子，本意亦在此。

在封建帝王时代，如果说，教育宫中女子是为了养成女“总管”的“内助之德”，以“垂范后世”的话，其带头作用便充分表现在皇家，其“垂训宫帙”，在国家，完全是为了“垂范公国”。所谓“母仪万国”，从外观看，是为了男性世界，而本质上，则是为了皇家世业，有利于皇室家天下的巩固。对此，《女四书》的编纂者在其序中说得十分明白，“有贤女然后有贤妇，有贤妇然后有贤母，有贤母然后有贤子孙。”庶民之家如此，官宦皇族之家亦如此。无独有偶，《内训》之

①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第47～48页，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版

《崇圣训章》也说,“自古国家肇基,皆有内助之德”,因而,崇奉千古之教,在于“化天下”“利安家室而垂庆后人”。

教育为社会和政治服务。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了其所有的教育形式包括女子教育必然受这种社会形态的制约和影响。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综上所述,封建社会之女子教育,“正内”也好,“训女”也好,概括地说,乃是“贤妻良母”、“相夫教子”主义的教育,实际上是男权主义的附属品,是封建强权政治的产物。虽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树人”教育得到社会的重视,严格的家庭教育确也培养出了象班昭、宋若华等“女圣人”,产生过象李清照这样的旷世才女,象武则天这样的政治女强人……然而,封建男权政治下,普天下广大女子在“女子无才便是德”氛围中,是不被教读书认字的。正如明末《闺范》的作者吕坤所揭示的那样,“今人养女多不教读书认字,盖亦防微杜渐之意”。封建统治者包括封建御用文人宣扬“无才是德”,并将这一理论习惯化、民间化,其因就在于认为“妇人识字多诲淫”。因为在他们看来,女子是专以嫁夫生子为其生活目的,所以不必有文化知识,因而不必读书。因此,正如冯飞《女性论》所言:封建主义之女子教育,“即维持其所谓家庭之便利,使妇女瘁其身心,而美其名曰‘良母贤妻主义’之教育。”

封建女子之“贤良”教育是终生的教育。在“媳妇熬成婆”的过程中,虽然其家庭和社会角色不断在变换,然而,其“本色”所赋与的“相夫教子”所必备的知识和要义,却在家庭实践中不断得到灌输和提高,而且自觉地训化下一代和下一代之家庭女性。这些可散见于《女四书》读本,还可见颜之推之《颜氏家训》;其专论者,更可见清人陆圻的《新妇谱》,陈确、查琪的《新妇谱补》;还可见明人谢肇制的《文海披抄》等等。如果说,《颜氏家训》只是散述了儿童女子到成年妇女的教义,而其它各书,却是专论成年包括老年妇女严守“三从”之道,“四德”之轨,在家里为“好媳妇”,在社会不作

“悍妇”的教本。虽然各书主旨不同,却也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女子教育的基本内容。

在此必须提及的是,历代封建统治者不仅从伦理道德观上重视女子训化,而且尤其注重贞烈女子的表彰,从行为上为广大妇女树立学习和模仿的样版。翻开中国二十五史,列入“烈女”之群的就有千百计,而且越往后,所列之“烈女”越多。据不完全统计,仅《清史稿》中即达400多人,在此,并不计地方立于牌坊而不见经传之烈女贤妇于内,否则,就得以千百万计了。列烈女之传也好,立女牌坊也好,其本意可通过刘向的《列女传》得到启示,目的在于养成女子“行为义表,言则中义;胎养子孙,以渐教化,既成其德,致其功业”的“母仪”;在于养成女子“廉正以方,动作有节,言成文章,咸晓事理,知世纪纲”的贤明;在于培养女子“豫识难易,原度天道”、“归义从安……专专小心”之仁智;在于严正女子“避嫌远别,……终不更二……勤正洁行,精专谨慎”之贞顺;在于树立妇人“必死无避……诚信勇敢……义之所在,赴之无疑”的节义观。总之,汇集封建女子教育之各方面内容,通过“列(烈)女”、“牌坊”的作用,更加强化了封建女子教育理论的立体感。这些典型,不但弥补了教本的严重不足而使教本理论现实化,而形象的感染更利于平民百姓接受。虽然刘向的本意不在此,旨在针对汉成帝时代后宫荒乱。但其历史和社会效果,确也在事实上起到了维系男权宗法社会的作用,同时,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封建社会女子教育的本质和内容。

回顾和总结中国女子教育的历史,是有益于民族、有益于人类的。然而,关于中国女子教育的史料,浩繁而分散,虽然自封建社会以来,有不少女传问世,各封建王朝,特别是清王朝,就女子教育问题做了不少工作,尤其是《女四书》的汇集,为其当时和后世女子教育提供了方便。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古往历史中,却没有一本象样的女子教育史。直到民国年间,随着民族文化的进步,随着五四时期妇女解放问题的提出,在1937年终于有了陈东原先生的《中国妇

女生活史》出版,有了梁瓿等编著的《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程溶凡的《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史》问世。前者,主要是论述女子生活的专著,没能也不可能用大量篇幅写女子教育问题,虽然其中也反应了各历史时期的女子教育概况,为我们研究这一专题不无引领作用;后者,确在“厚今薄古”上做文章,然而只是花了很大的笔墨堆砌了民国时期关于女子教育——主要是女子学校(各类学校教育)的材料。当然,不否定这一研究的成功和意义,也不否认它的存在价值,但人们可难以从中追溯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女子教育的线索、实质和。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文化出版事业的不断繁荣,又有了不少涉及女子教育资料的汇编问世,诸如《蒙学十篇》、《蒙养书集成》、《治家修养格言十种》等等,然而,这些也只是封建时代女子教育资料的再汇集而已(当然,汇集者在注释方面做了大量的有意义的工作),也很难人们从中悟出古代中国 and 过去社会中关于女子教育的实质。

严格地说,女子的解放,不但是妇女自身肉体的解放,更应是她们人性和心灵的解放。人性和心灵的解放,是以肉体的解放为先决条件,而肉体的解放的巩固和彻底性,又是以其人性和心灵的解放为前提的。尤其是洞析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史后,我们更领悟到,女子人性和心灵解放所获得的智力的发展与发挥,不仅关系她们自身在社会的地位,而且特别关系到其子女的教育水准和前途。从这个意义而言,女子教育是人类教育发展的基础,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远古至秦的女子教育	(1)
一 女子社会地位的转变	(1)
二 礼教、妇道与教育内容	(4)
三 女子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8)
四 秦崇尚礼法与女子教育	(10)
五 “周室三母”	(11)
六 孔母、孟母的教育实践	(13)
七 孔子、孟子论女子教育及其影响	(16)
第二章 汉代的女子教育	(22)
一 汉代女性的生活	(22)
二 “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与女子教育	(25)
三 褒奖贞节的教育内容	(29)
四 “汉代孔子”——董仲舒的女子教育观	(31)
五 刘向的《列女传》	(33)
六 班昭及其《女诫》	(37)
七 女子家庭教育——蔡文姬个案	(41)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的女子教育	(49)
一 重门第血统的婚姻观念与女性生活	(49)
二 娶妇标准与女子教育的道德取向	(53)
三 胎教理论的发展	(58)
四 《女典篇》、《文史箴》和《贤媛篇》	(60)
五 妇女授徒考察	(63)
六 范曄和颜之推的女子教育主张	(65)

第四章	隋唐时期的女子教育	(72)
一	隋唐社会与女子生活	(72)
二	隋唐后宫特盛与妇女心理	(77)
三	女子教育地位低中有高	(80)
四	教坊、梨园与女子艺术教育	(84)
五	文学才女的成长	(87)
六	孙思邈的胎教学说	(89)
七	郑氏的《女孝经》	(92)
八	女教经典《女论语》	(94)
第五章	宋元时期的女子教育	(103)
一	宋元时期的女子生活	(103)
二	袁采的女子教育新观念	(109)
三	司马光的《家范》和《训俭示康》	(113)
四	唐婉的悲剧	(116)
五	一代女词人与家教——李清照个案	(119)
六	“二程”和朱熹论女子教育	(125)
七	宋元歌伎舞女教育	(130)
第六章	明代的女子教育	(135)
一	明代的女性生活	(135)
二	女子“才德观”的演变	(138)
三	仁孝文皇后的《内训》	(142)
四	《闺范》和《温氏母训》	(148)
五	李贽的女子观及女子教育观	(157)
六	“西学东渐”对传统女子教育的冲击	(160)
第七章	清代前期的女子教育	(164)
一	清代社会与女性生活	(164)
二	宗教化贞操对女子教育的导向	(171)
三	好媳妇与悍妇对女子教育价值观的影响	(174)

四	李汝珍、俞正燮对“贞操”的批判	(180)
五	蓝鼎元的《女学》和陈宏谋的《教女遗规》	(182)
六	女子教育的通俗范本 ——《女儿经》、《改良女儿经》	(187)
七	唐甄论女子教育	(190)
八	章学诚论女子教育	(193)
第八章	戊戌维新以前的女子教育	(195)
一	西方新思潮的涌入与女子教育新观念的传播	(195)
二	不缠足运动与女子教育	(199)
三	太平天国的女子教育革命	(201)
四	教会在中国办的女子学校	(206)
五	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学——经正女学堂	(210)
六	陈虬、郑观应和康同薇论女子教育	(214)
七	康有为、梁启超的女子教育思想	(218)
第九章	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的女子教育	(226)
一	女权的倡导与女性心理的骚动	(226)
二	私家办理的女子学校	(240)
三	各地女学的兴起	(244)
四	女子职业学校的发端	(249)
五	教会女子教育的成就	(252)
六	女子留学教育之兴	(256)
七	女子教育在学制上地位的改观	(260)
八	女子教育的逆流	(266)
九	秋瑾及其女子教育思想	(270)
第十章	民国初期的女子教育	(276)
一	时局与女性生活	(276)
二	兴女学热潮和女子学校教育	(280)
三	女子高等教育与留学教育	(291)

四	现代母亲的启蒙教育·····	(294)
五	“贤妻良母主义”的女子教育逆流·····	(299)
六	袁世凯的女子教育观·····	(302)
七	孙中山论女子教育·····	(305)
八	蔡元培的女子教育思想·····	(308)
第十一章	五四时期的女子教育·····	(313)
一	新文化运动与妇女解放·····	(313)
二	高等学校男女同校的肇始·····	(324)
三	《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的颁行·····	(329)
四	女子中学教育的拓展·····	(332)
五	女子职业与婚姻解放后教育界的徬徨·····	(337)
六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论女子教育·····	(340)
七	陶行知的女子教育思想·····	(349)
第十二章	五四以后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的女子教育·····	(354)
一	五四以后的女性生活·····	(354)
二	女子普通教育·····	(360)
三	女子高等教育·····	(365)
四	女子社会教育·····	(369)
五	妇女干部训练·····	(373)
六	教会女子教育·····	(376)
七	关于女子教育的论争·····	(381)
八	国民党要员论女子教育·····	(385)
第十三章	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的女子教育·····	(393)
一	革命斗争与女性生活·····	(393)
二	反封建、反传统的女子教育·····	(397)
三	与革命斗争相一致的女子教育·····	(402)
四	红军妇女教育·····	(406)
后 记	·····	(410)